

## 在“一国两制”护佑下开创香港发展新天地

### ——纪念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

本报记者 汪仲启

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53秒,随着英国国旗缓缓降落,一段被鸦片和炮火熏黑的屈辱历史结束了。7月1日零点,历史的时针指向香港。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,五星红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冉冉升起。这宣示着,分离了一个半世纪之后,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从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“一国两制”证明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

作为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,香港被人们称为“东方之珠”。在回归祖国的怀抱前,一些人预测,这颗闪耀的明珠将从此黯然失色。然而,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,美国《时代》周刊(亚洲版)在其封面文章中坦承:“本刊的姊妹杂志《财富》曾糟糕而错误地预测,香港回归中国会导致其毁灭,但香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活力。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《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》中,香港依然是所有中国城市中的翘楚,宜居指数、可持续指数等位列全国城市的榜首,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则排名次席。

回归之前,许多香港人也感到很惶恐,担心香港原有的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等“好东西”会失去。但回归后的实践证明,在“一国”的前提下,香港按照《基本法》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,不仅保持了国际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地位,而且原有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保持不变,香港同胞实现了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,享有比港英时期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。

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冯颖红对本报表示,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,港人对“一国两制”经历了从排斥到认同度逐步提高的过程。80年代初的一份调查表明,当时港人赞成将香港归还中国的只有3%,而多达56%的人认为解决香港问题最不利的方案是归还中国,而到了香港回归十周年之后,有超过七成的市民表示对“一国两制”有信心。

香港回归以来,中央政府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繁荣、稳定和发展。帮助香港安然度过了两次全球性的经济金融风暴,顺利克服了非典疫情所造成的困境,让香港充满活力。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指出,“一国两制”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历程之中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。推进“一国两制”不断向前发展,是内地和香港各界人士的共同责任。

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表示,“一国两制”有很长的路要走,不能低估未来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、挑战及风险,“勿要期望在‘一国两制’实践过程中会风平浪静。”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王郡里表示,长期以来,香港都是信息的重要集散地,回归后中央对香港采用“港人治港”的方针,但这并未完全消除颠覆势力的威胁。香港安全问题“并非完全是法律问题,而是政治及战略问题。”香港立法会前主席、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表示,《基本法》是“一国两制”的依据,要继续发展香港民主,成功进行“一国两制”,就一定要严格按照《基本法》、深入理解《基本法》。香港人民要转变心态。“‘一国两制’刚提出的时候,香港的GDP占我们国家的差不多三分之一,比四分之一多;现在不到三个百分点。很多事都变了,但我们还是只想着我们过去怎么强,这样不行。”

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对本报表示,香港回归祖国之后20年的实践证明,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是可以融合的,这是中国人民的首创,此前没有人可以想象。这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,更对于人类治理具有重要意义,“这预示着一一种在重大差异情况下

实现政治统一的解决方案。”

《基本法》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

近几年来，随着内地发展突飞猛进，影响力与日俱增，两地的人员往来日益密集，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开始在香港出现。自2011年以来，内地“双非婴儿”在香港引起广泛关注。随后，“D&G拍照”事件、“狗与蝗虫”对骂事件、“内地游客地铁进食”事件、“奶粉限购”事件、“内地儿童在港便溺”事件等一一出现，部分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滋生不满情绪。一些以香港“本土化”甚至“港独”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也“应运而生”。武汉大学法学院祝捷教授表示，这种谋求“香港独立”的社会思潮，近年来已由隐秘的只言片语发展为一种理论体系，更有少数激进主义者将“港独”思想付诸实践，公然在社会运动中打出“港独”旗号。

经济上，香港成功抵御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，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，其营商环境和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一直位居前列。但由于香港经济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，经济增速有所回落；与此同时，内地的发展却一日千里。两相对照，难免使一些港人产生“今不如昔”的失落感，甚至有可能缅怀殖民时代的“光辉岁月”。社会上，贫富差距拉大、上流空间收窄、房价高企等社会问题逐步显现。对许多年轻人而言，他们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，实际上却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。他们很容易将此归咎于中央政府。政治上，香港回归后形成了建制派与反对派的尖锐对立。反对派自诩为本土利益的代表，将民主理解为没有中央干预的完全自治。复旦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周帆教授对本报表示，目前香港面临社会分裂的问题。近两年来，这种趋势愈加明显，“表现在选举中即中间党派被抛弃了。”文化上，由于港英当局长期在香港实施“疏离教育”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香港人，缺乏对祖国和民族的认知、认同和归属感。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就曾指出，很多香港人对中国的历史和认识大不如前，基本文化竟不如当年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教育，这十分值得反思。祝捷教授表示，香港本土意识存在两种叙述方式：一种视殖民政府为“他者”，另一种视中国内地为“他者”。由于历史形势的变化，前者逐渐为后者所掩盖和遮蔽，沦为分离主义者谋求“港独”的口号。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认为，现有的制度安排将内地人与香港人隔离开来，一方面限制了内地居民移民香港，促使香港人口结构的本土化；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，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刘兆佳认为，上述问题大多是过去两三年发生的，并非源于“一国两制”，而是源于内地、香港和国际上的变化。目前，虽然香港人对“一国两制”的信心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所起伏，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弃“一国两制”，或者说认为还有更好的针对香港前途的安排。极少数人提出的所谓本土主义或“港独”意识，只是一种情绪宣泄，而不是针对现实的政治纲领，在社会上也没有得到共鸣。但是，从保障“一国两制”顺利实施的角度来看，必须面对这些变化，积极妥善把问题处理好，理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。对香港的反对派来说，不要妄图冲击中央的权威和权力，要在《宪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框架下进行活动，把政治目标和行动都局限在香港，不要妄图让香港扮演它不该扮演的角色。

人心回归是香港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

从根本上来说，这些问题的处理，都有赖于正确理解和深入发展“一国两制”。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齐鹏飞教授对本报表示，“一国两制”构想提出并付诸实践以来已有近40年的时间，然而关于“一国两制”理论的创新和发展，远远落后于香港回归的丰富实践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浦兴祖教授对本报表示，“两制”并非平行线的关系，而是“人”字关系，下部有所区分，上部统一于社会主义制度。虽然如此，一国之中两种制度的和谐共存，依然需要经过一个艰难细致的磨合过程。

要增强“一国两制”的稳定性和活力，香港同内地的互联互通是基础和关键。其中，粤港澳的互联互通更是重中之重。为此，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进港珠澳大桥、广深港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，另一方面逐步深化两地社会民生方面的合作。比如，粤港澳共同开展研究编制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，2012年即在三地同时公布实施，推动逐步探索建立香港居民在粤上学、就医、养

老等福利保障，推动建设优质生活圈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研究所研究员蔡赤萌表示，香港未来发展动能的构建，要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节点功能与优势定位，融入“一带一路”战略需求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，提升创新科技与高端服务业，强化作为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。

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姚俭建教授对本报表示，人心回归是香港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，比体制和领土的回归艰难得多。“只有赢得成长者，赢得香港的新生代，才能赢得‘一国两制’的未来。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于铭松教授认为，做好香港中产专业人士的统战工作，根本上是要解决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。要在具体的统战工作中，强化对于他们的国家意识教育，照顾他们的实际利益，拓展交流渠道，搭建服务平台。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徐海波认为，香港特区政府尤应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执政绩效；排除阻力推行港式国民教育和去殖化教育；与香港民间社会、社运组织积极互动，有效引导和吸纳香港社会运动提出的合理的体制外诉求。

中央政府则应加快完善“一国两制”制度框架和《基本法》的建设；继续加强港人和内地的对话、沟通和交流；统战方式应在吸纳香港精英的同时注重吸纳香港普通大众。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徐晓迪认为，香港发展到今天，棘手的问题大都集中在香港市民的民生问题上，特别是中低阶层收入群体的生存及青年人的就业问题，2014年“十一”参加“占中”游行的人群大多来自这些群体。所以，保障“一国两制”的有效实施，保持香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基础，保障其社会稳定可预期是关键，而形成两地价值与命运共同体是根本。